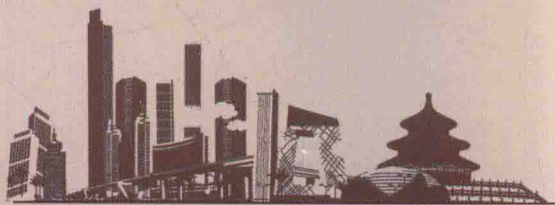


北京市语言文字培训测试丛书

PUTONGHUA
DAJIANGTANG



普通话大讲堂

袁钟瑞 著

书馆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普通话大讲堂

袁钟瑞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普通话大讲堂/袁钟瑞著.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656-2936-5

I. ①普… II. ①袁… III. ①普通话—教材 IV. ①H1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82977 号

PUTONGHUA DAJIANGTANG

普通话大讲堂

袁钟瑞 著

责任编辑 孙少红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n.com.cn

印 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9.25

字 数 140 千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目 录

第一讲	汉语方言	(3)
第二讲	古代的汉民族共同语	(13)
第三讲	从官话到国语	(19)
第四讲	国语、普通话、华语	(24)
第五讲	新中国的推广普通话工作	(28)
第六讲	新时期的推广普通话工作	(35)
第七讲	新世纪的推广普通话工作	(42)
第八讲	北京话与普通话	(56)
第九讲	普通话的读音	(61)
第十讲	普通话与汉语	(70)
第十一讲	普通话水平	(77)
第十二讲	学习普通话的几个小难题	(83)
第十三讲	普通话与语文教学	(90)
第十四讲	普通话的应用	(97)
第十五讲	普通话的实用价值	(105)
第十六讲	普通话的文化价值	(111)
第十七讲	普通话的审美价值	(115)
第十八讲	构建和谐的社会语言生活	(122)

附录

普通话与英语的语音比较	(132)
推普啦啦歌	(142)

推广普通话这个题目很大，从哪儿说起呢？

先说个笑话吧。

上海市静安区检察院的检察长跟我说过一段有趣的经历。90年代初，他到哈尔滨出差，在宾馆服务台登记入住时，女服务员见他身穿检察官制服，就问他：“有 jiāhuoshìr 没有？”



这服务员问的是“有 jiāhuoshìr 没有？”可检察长听成了“有家务事儿没有”，就回答说“我没有家务事”。服务员说：“谁问你家务事儿了，我是问你有没有 jiāhuoshìr？”检察长很不高兴，说：“我家在上海，在这里有什么家务事？”服务员也不高兴了：“我问你有没有 jiāhuoshìr？你怎么老打岔呢？”

那到底什么是 jiāhuoshìr 呢？

这 jiāhuoshìr 是东北土话，写出来就是“家伙什儿”。这服务员是在问他带没带枪支。东北话的“家伙什儿”就是武器、工具的意思，比如打仗时刀和枪是家伙什儿，吃饭时筷子和碗是家伙什儿，写字时纸墨笔砚就是家伙什儿。听我这样一解释，检察长恍然大悟，哈哈大笑，但随后又问：“她为什么不说普通话呢？”

是啊，宾馆的服务员面对外地客人，为什么不说普通话呢？

你八成也遇到或者听到过这类笑话。尽管早已进入 21 世

2 普通话大讲堂

纪，但在语言种类繁多、方言分歧严重的中国，这类笑话至今还在随时发生着。

方言分歧妨碍着人们的现代交际，妨碍着现代化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妨碍着社会的进步。

所以我们要大力推行、积极普及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第一讲

汉语方言

中国是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的人口大国。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提供的资料说，我国 56 个民族共使用着约 80 种不同的语言，汉语（包括普通话和各地方言）只是其中的一种。

这些语言分别属于汉藏语系（如汉语、藏语、景颇语、彝语、苗语、壮语等）、阿尔泰语系（如蒙古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南岛语系（如高山语）、南亚语系（如佤语等）、印欧语系（如俄罗斯语、塔吉克语等）。其中使用汉语的人口最多，除了汉族，还有满族、回族、大部分畲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也都使用汉语。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

不同的民族语言之间固然互相听不懂，但是说同一种语言的也不一定都能自由交谈，因为大多数语言都有不同地区的方言差别（例如内蒙古东部和西部的蒙古族互相交谈也有一定的障碍），汉语内部的方言分歧就更严重了。汉语方言的种类实在太多，各地方言之间的差异也实在太大了。

所谓方言就是“一方之言”，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地方话”，是在某个或大或小的地区通行的口头交际工具。方言是民族语言在历史长河的发展中分化出来的地域性变体。所谓地域性变体，是相对于民族共同语而言，汉语方言自然是相对于普通话来说的。普通话通行于全国，是国家通用语言；方言通行于某几个省，或某个省，或更小的地区，是局部地方的通用语言。普通话为全体汉族人群乃至整个中华民族服务，而方言只能为地方局部的人群服务。从组成语言的三要素“语音、词汇、语法”来看，不同的方言之间、方言和普通话之间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是兄弟姐妹的关系，都是同一支古老语言分化和发展的

结果。

从大处说，现代汉语可分为七大方言：

首先是北方方言，又叫广义的官话，流通在我国中原、东北、西北和西南的广大地区。

北方方言内部还可以再分为四大次方言：

一是华北东北次方言，又叫狭义的官话。覆盖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东部、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山东省、河南省、安徽省北部、江苏省北部、湖北省北部；

二是西北次方言，又叫西北官话。覆盖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西部、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三是西南次方言，又叫西南官话。覆盖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湖北省大部、湖南省西北部、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北部；

四是江淮次方言，又叫下江官话。覆盖安徽省内长江两岸、江苏省江北一带以及自九江至南京、镇江的两岸沿江地区。

七大方言里，以北方话分布最广，其分布地域大约占全国总面积的70%；使用的人口也最多，占汉语人口的70%左右，其余六大方言的使用人口总和大约只占汉语人口的30%。

第二种大方言是吴方言，又叫吴语，即江浙话。分布在上海市、江苏省江南部分和浙江省大部。吴方言曾经以苏州话为代表，现在以上海话为代表。

第三种大方言是赣方言，又叫赣语，即江西话。分布在江西省、福建省西北部、湖南省东部以及湖北省东南部。赣方言以南昌话为代表。

第四种大方言是湘方言，又叫湘语，即湖南话。分布在湖南省大部。湖南话曾经以双峰话为代表，现在以长沙话为代表。

第五种大方言是客家方言，又叫客家话、客话。客家话分布比较分散，比较集中的地方是广东省东北部、福建省西北部、江西省与湖北省、广东省、福建省接壤的地区，以及四川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台湾省的局部地区。东南亚各国的华人中有很多说客家话的。客家话以广东省的梅州话为代表。

第六种大方言是粤方言，又叫粤语、广府话、白话。分布在广东省大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东南部，以及港澳地区和北美华人社区。粤方

言以广州话为代表。

第七种大方言是闽方言，又叫闽语，即福建话。闽方言分布很广，包括福建省、海南省、台湾省、浙江省南部、广东省东部的潮汕地区和西部的雷州半岛。闽方言内部分歧很大，大概来说，闽方言可以划分为五片次方言——闽南片以厦门话为代表，闽东片以福州话为代表，闽北片以建瓯话为代表，闽中片以永安话为代表，莆田仙游片以莆田话为代表。闽方言(特别是闽南话)在东南亚华人社区流行很广。

除北方方言以外的这六大方言都叫作南方方言。

同南方方言比起来，北方方言内部的一致性较强，所以东北的黑龙江人同大西南的云贵人交谈，可以基本听懂对方的意思，保证基本的交际需要。北方自古流行一句谚语：“从南京到北京，人生话不生。”就是说北京话是华北东北次方言，南京话属于江淮次方言，都属于北方话区，可以互相听得懂。

北方方言内部的主要差异在语音，语音的主要差异是每个声调的调值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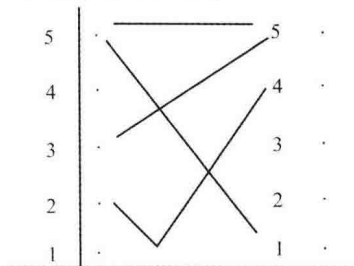
声调就是不同的音高变化。比如普通话有4个声调——阴平、阳平、上(shǎng)声、去声，也可以叫第一声到第四声。

声调是汉语的最主要特征，不同的声调表示不同的意义，例如“汤、糖、躺、烫”，“敲、瞧、巧、俏”，“穿、船、喘、串”，都是4种互不关联的意义。

那么，调值跟声调是什么关系呢？

大家已经知道，普通话这4种声调，每种声调的音高变化是不一样的，每种声调的音高实际变化就是调值。

我们把每个声调的音高从低到高划分为5度，那么普通话阴阳上去四声的调值就分别是55、35、214、51。



6 普通话大讲堂

如果从发音开头到最后，音高始终在最高的 5，那就是阴平调（第一声），属于高平调，比如“东、方、之、珠”。

第二声的阳平调的发音，是从中间高度的 3 升到最高的 5，属于中升调，比如“门、神、秦、琼”。

第三声的上声调，则是从偏下的 2 先降到最低的 1 再拐上来升到较高的 4（也有专家认为是升到 3），属于降升调，比如“美、好、理、想”。

至于去声调（第四声）的发音，就是从最高的 5 度降到最低的 1 度，它是全降调，比如“最、后、胜、利”。

各方言的四声调值跟普通话是有所不同的。调值是各地方言面貌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也是区分北方方言各地差异的最显著标志。我们之所以能听出某个人是东北人还是四川人，就是依靠他说话的调值做依据的。下面这个表里列出北方话区 9 个城市方言的调值，它们都有“阴阳上去”四声，你可以比较一下它们的不同。如果你用各地不同的调值分别说“山明水秀、千奇百怪、升学考试、风调雨顺、封神演义、山盟海誓”等词语，你就能品味到各地方言的特殊味道。

调 值	阴 平	阳 平	上 声	去 声
普通话(北京话)	55	35	214	51
天津话	11	45	213	53
唐山话	55	44	214	51
沈阳话	33	35	213	41
郑州话	24	42	55	31
济南话	213	53	55	31
武汉话	55	213	42	35
成都话	44	31	53	13
西安话	21	24	53	55

这七大方言乃是现代汉语方言非常粗略的划分，实际上方言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不但北方人听不懂广东人、福建人说话，就连广东省的广州人、梅州人和汕头人之间，福建省的福州人、莆田人、厦门人之间也互相听不懂对方的话。方言最复杂的福建省大田县就有 5 种互相难以通话的土语。隔山隔水就听不懂的现象在南方方言区各个省份都是常见的。

不同方言听不懂，固然是麻烦事，就怕以为听懂了其实是误会了。有一年，长沙一所高校的校长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一个从娄底来的新生在联欢会上朗诵自己的诗作：“mǎguā, mǎguā, fóng mǎguā”。听众莫名其妙，难道是“马褂，马褂，红马褂”？而 magua 这个音在湖南有的地方是“青蛙”的意思，但“青蛙，青蛙，红青蛙”更令人费解。后来见到那位同学的诗稿才明白，原来他写的是“玫瑰，玫瑰，红玫瑰”！还有一年我去梅州，一位法院院长在座谈会上发言说：“我们只有说好普通话，才能骗民服务。”我听了实在是奇怪，法院院长，说普通话骗民？经追问，才知道是“便民”！客家话把不送气声母的“便”说成送气声母的“骗”。



大方言下面划分次方言，次方言下面划分土语群和土语。比如北方话这个大方言下面有华北东北次方言，华北东北次方言下面有河北土语群，河北土语群下面有北京话、承德话、唐山话、保定话、邯郸话、沧州话等等土语。如果说方言是一个地方之言，那么土语就是一个地点之言。当然，平时我们就“方言土语”这么含混着说了。

不光是在南方有“十里八里不同音”、“隔山隔水话不同”的说法，就是在北方，离开几十里地，方言土语就有可能大不相同。比如北京周边的延庆、平谷、大兴、通州，跟北京中心城区的土话就有明显不同；同是辽宁话，沈阳和相距不远的辽阳，两地土话也有差异，辽西话和辽北话的差异就更大了。

可以说，我们的汉语是一个丰富的方言宝库。

“方言岛”也是令人诧异的语言现象。所谓方言岛就是在一个较大的方言区内有个较小的操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远地方言的地域，这个小地域可以是县，也可以是镇、乡、村。例如广东省中山市是粤方言区，但中山市区附近有个小镇，镇里的人都说与周围粤方言完全不同的客家话。

方言岛是古代或者近代驻军和移民现象造成的。在广东、福建、海南乃至北方很多地方都常见方言岛现象，客家话散布在好几个省，就是散布在各地的客家方言岛。再比如，天津话只通行在天津中心城区和塘沽地区，同周围的武清区、静海县、宁河区甚至只相距十几公里的杨柳青的土话都截然不同。

听天津的老人传说，明朝初年，皇帝朱元璋派遣燕王朱棣率领大批朝廷军队驻扎在海河两岸并在此繁衍生息，因为这些军人大都是安徽北部人，所以就把安徽话留下来了。后来的淮军北上天津，又巩固了这个方言岛。

这个传说是有根据的。天津话这个方言岛是在河北方言区内的一个较大的安徽方言岛，也可以说天津话是安徽北部宿州一带的话与河北话的合成品。60年代初，天津师专的韩根东老师看一个安徽的县城杂技团的演出，听到杂技团报幕员用天津话报幕，很奇怪。他到后台去问，你们到天津来演出就用天津话报幕吗？人家回答，我们不会天津话，报幕员用的是我们家乡话呀！韩老师联想到天津人是安徽人后裔的传说，利用暑假机会自费到安徽寻找天津话的“发源地”，历经波折，总算找到了宿州附近，发现那里的土话跟天津话很接近。最后确定宿州是天津话的母方言。最近几年，天津的语言学者又到安徽去做进一步的方言调查，证实并且丰富了原来的调查结果，同时也发现天津话与南京、合肥的江淮方言也有很多相似之处。

还有不少这样的实例。山东省青州市，那里有个满族村，那里的满族居民是清朝雍正八年起奉朝廷旨令驻守青州的满族旗兵的后代，直到今天那里居民仍然保留着从北边带来的口音，说着同周围青州人明显不同的话。湖北荆州古城里有一片北京官话的老居民区，据说也是当年朝廷派遣的驻军留下来的。

还有，20世纪初修建津浦铁路，从天津迁到南京浦口许多铁路工人，于是直到六七十年代浦口还有个说天津话的铁路职工聚居区。新中国在建国初期曾大规模地在祖国的西部地区搞工业建设，从东部沿海地

区迁移过去很多工人和技术人员，因此在今天西部的新兴工业城市如洛阳、包头、银川、白银、石河子等城市里很容易找到说北京话、天津话、上海话、东北话的小方言岛。近30年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量农民向城市流动，同乡聚居，形成了更新的小方言岛，如北京南郊的“浙江村”、海淀的“新疆村”都是。随着人口流动，小方言岛会随时产生的。

虽然方言之间的分歧主要体现在语音差异方面，但是词汇之间的差异也十分可观。比如普通话的“酱油、西红柿、花生米”在天津话叫“青酱、火柿子、果仁儿”，“花生”则叫“大仁果”，天津的“蒜薹”北京叫“蒜苗”，天津的“果子、棵算儿”北京叫“油条、薄脆”。京津唐三地互为近邻，但是北京人说的“白薯”，唐山人叫“红薯”。我问一个天津的小姑娘：“你爱吃白薯吗？”她奇怪地反问我：“白鼠怎么吃？”我说：“蒸着吃，煮着吃，烤着吃，熬粥吃，都行啊。”她说：“啊？多恶心哪！”后来才明白，她是把“白薯”当成“白鼠”了，因为天津人管“白薯”叫“山芋”（山芋是江淮下江一带对白薯的称呼，又是一个佐证）。而到了离京津不远的保定，这“白薯”又叫成“山药”了，而北京人说的“山药”，保定人却叫“麻山药”。山西把“土豆”（马铃薯）叫作“山药蛋”。而安徽人不知道“山药蛋”就是“土豆”，还奇怪为什么没见过圆形的山药呢。1988年我第一次到广州，在白云山公园，我向一位老者打听“缆车在什么地方”，老者说：“很方便的啦，向前走，一拐弯。”我向前走，一拐弯，迎面而来的是“男厕”！原来广东人管“缆车”叫“索道”，说“缆车”，就听成了“男厕”。



除了词语差异，方言的表达方式也跟普通话有很多不同。我在上海郊区游览的时候，问一位老奶奶“高寿了”，老奶奶听不懂，又问她“多大年纪了”，她还是听不懂。旁边一位大嫂替我翻译说“问你几岁了？”老奶奶当即回答“七十八！”而在北方，问老人“几岁了”，是很不礼貌的。有一位成都人到北京商场买衣服，问价钱：“这个好多钱？”售货员就回答说：“不贵。”他追问：“到底好多钱？”售货员还是回答：“真的不贵。”差点儿吵起来，因为他问的是“多少钱”，生气那个售货员为什么就是不告诉他“多少钱”！沈阳人总是把“我们学校”说成“咱们学校”，把“我家”说成“咱家”，把“我妈”说成“咱妈”，就是不把“我媳妇”说成“咱媳妇”。有的北方家庭娶了南方媳妇，因为方言误会闹得婆媳不和的例子也是有的。轻的说是妨碍交际，重的说就会影响人民团结。

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薛中锐给我讲过他的一段经历，说他在曲阜游览孔府时向路边一位老大娘问路，先客气地向大娘打个招呼：“大娘，您吃饭了吗？”大娘回答说：“食久矣。”艺术家一时没反应过来，不知老人家在说什么。后来经本地人点拨，才知道“食久矣”就是“早就吃过了”！薛先生说：“曲阜真不愧是孔圣人的故乡，连老太太说话都是先秦古汉语，透着有学问哪！”



其实，并不是圣人故乡的老太太有多深的学问，而是各地方言或多或少地都保留着一些古汉语的痕迹。我当年下乡在东北，村里老乡管我们集体户的食堂叫“膳房”，我们听了很高兴，因为“膳房”和皇上的“御膳房”只差一个字。如今的粤方言、闽方言都较多地保留了中古汉语的特点，用粤方言、闽方言朗读唐诗能体现唐诗本来的韵律。我曾问厦门大学一位研究闽方言的老教授：“能不能认为，李白、杜甫当年说的话就是

今天闽南话这个味道呢？”教授想了想说：“可以这么想象吧。”

为什么方言保留古汉语的成分比较多呢？可以做这样的推想，在人们“张袂成阴、挥汗成雨、比肩继踵而在”的繁华都市，本地话与各方言乃至其他民族语言、外国语言都相互碰撞、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语言的发展变化是很快的；而偏僻的乡村山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极少与外界沟通，特别是自然条件比北方优越的江南水乡和东南丘陵地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尤其完善，衣食住行用不着跟外界打什么交道（同外界打交道是极少数人的事儿），像老子所言：“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外界发生了什么事儿全然与己无关，跟陶渊明在《桃花源记》里描述的一样，“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因此，这里的语言自然也跟与世隔绝差不多，一辈一辈地就把古代祖先的语言比较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六大南方方言的流通范围都比北方方言地域小得多，是因为北方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华的政治、文化中心，交通便利，城市繁荣，人流频繁，且多战乱、多饥荒，民间的逃荒逃难和官方的大规模移民都造成方言的大交错、大融合，因此北方的方言内部一致性范围远远大于南方地区。这恐怕就是北方方言区的地盘十分广大，“从南京到北京，人生活不生”的基本原因。

尽管祖先们给我们留下不少音韵学的著作，但是由于记音方法不如今天的科学和精密，更没有留下音频资料，因此很多方言现象我们也总是说不详细。例如唐山话，把“用鼻子闻一闻”叫“用鼻子听一听”，把“不知道”说成“知不道”，可是唐山周边的北京、天津、承德、秦皇岛都不这样说。诸如此类的细微差异是怎么形成的，就说不清楚了。但是我们可以负责地说，由于千万年来人类原始部落不断地聚集、合并再分化、衍生，由于远古至近代小农经济的生活方式造成的人群隔离，甚至隔一道河一道山就可能祖祖辈辈不相往来，各个群落之间的语言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逐渐产生变异，各自凝固起来，就形成不同的土语，差异更大的就形成不同的方言。这种差异直到当代还在继续产生，例如“卡其布”，北京人叫“kǎjī 布”，天津人就叫“qiǎqí 布”；大陆与台湾隔绝几十年，词汇差异十分明显，如大陆说“通过某种渠道”，台湾讲“透过某种管道”，大陆和台湾有差异的词汇数量之多是一本厚厚的词典的容量。

方言在当今的发展过程中遵循着向共同语靠拢的趋势。随着交通的便捷、教育的普及、广播电视的普及以及人们社会交往的广泛和频繁，

一个地区的方言向本地中心城市方言靠拢和各地方言向普通话靠拢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靠拢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以新老天津话为例，老天津话的所谓“齿音字”（即把翘舌音的 zh、ch、sh 读成平舌音的 z、c、s）很突出的，但如今凡是接受过义务教育的天津青少年都会说很好的普通话，即便是说天津话，也把平翘舌音分得一清二楚，绝不再是老天津人说的那种平翘舌音不分的老天津话了。老天津话把“饺子”说成“交（阴平调值 11，对应普通话阴平的 55）子”，新天津话也说成“饺（调值是对应普通话上声 214 的 24）”了。词汇方面向普通话靠拢的趋势也十分明显，例如老天津人所说的“青酱、火柿子”如今都被“酱油、西红柿”所取代。

第二讲

古代的汉民族共同语

说了半天方言，怎么还没说到普通话呢？

是啊，该说说普通话了。可是，因为普通话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所以在说普通话之前，我还想聊聊古代的民族共同语。

我们的民族共同语经历了从雅言、通语、天下通语到官话、国语、普通话的漫长历程。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大国，方言分歧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存在而且相当严重了。当时中原地区管“虎”就叫“虎”，可是在地处长江中游的楚国却叫“於菟(wūtú)”。《孟子》里说：“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挹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挹而求其楚，亦不可得也。”大意是说，有个楚国官员想让他儿子学会齐国话，请一位齐国人教儿子学齐国话，可是周围的楚国人都说楚国话，实际上是干扰他儿子的学习，所以虽然每天都严厉地督促他儿子努力学习齐国话，却总是达不到目的。而把他儿子送到齐国的庄岳住了几年，就学会齐国话了，这时再每天严厉督促他说楚国话，却又不会说了。孟子用这个例子说明语言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甚至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从这里了解到早在孟子那个时代，方言分歧已经很严重了，而且这个故事还告诉我们学习语言必须有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

春秋战国时期与方言同时并存着的天下共同语，叫作“雅言”。这也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当时天下百家争鸣，论辩和游说十分盛行，法家、名家、墨家、儒家、道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各派人物周游天下鼓吹自家学说，能说别人不懂的家乡话吗？只能说天下各国都听得懂的雅言。苏秦、张仪奔走七国宣传合纵连横也必须说雅言。记载孔子